

# 美国极右翼暴力兴起的政治逻辑及 发展趋势<sup>[1]</sup>

李依涵 武兵科

**【内容提要】**近十余年来，美国国内以白人至上主义、反联邦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的极右翼暴力事件激增。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具有以“独狼”为袭击主体、以互联网为激进化平台、现役或退役军人参与比例高、袭击目标与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等特点。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政治逻辑：美国当前的国家大转型是宏观背景；右翼派别的分裂与极端化是中观机制；联邦政府对国内反恐关注不足以及共和党对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庇护态度为其兴起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拜登政府发布的首个国内反恐战略虽然充满雄心，但却面临重重挑战。未来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将长期存在，极右翼思想及其暴力偏好会不断渗透到主流社会之中，极右翼暴力活动与极左翼暴力活动恐将引发冲突螺旋，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与全球极右翼运动的联系愈趋紧密。

**【关键词】**极右翼暴力活动 美国反恐 恐怖主义 保守主义

**【作者简介】**李依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武兵科，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3) 01-0043-29

---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多重危机和博弈加剧背景下的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1AGJ014）、“新冠肺炎疫情下暴力极端主义的发展动向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1AGJ005）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2lzujbkydx042）的阶段性成果。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长达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将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圣战运动作为海内外重点反恐对象。这场战争虽然耗资巨大且颇受争议，却有效地防范了美国本土遭遇境外恐怖势力的袭击。此后美国本土仅发生过一起与外国恐怖组织直接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sup>[1]</sup>但美国国内并未因此安定，过去十余年间，美国国内的恐怖袭击活动愈演愈烈。其中来自极右翼势力的暴力活动产生的威胁尤甚，并在2021年的“国会暴乱”中达到高潮，因此引起了拜登政府的高度重视，改变了美国政府对反恐议题的关注方向。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指出：“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的兴起是美国必须面对和击败的威胁。”<sup>[2]</sup>随后，拜登宣布对国内的反恐能力进行“百日审查”，情报部门迅速对国内极端暴力威胁展开评估，美国首份《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下文简称《打击恐怖主义战略》）随即发布。该战略指出，种族主义和民兵极端主义驱动的极右翼暴力活动是美国国内安全最致命的威胁。<sup>[3]</sup>

## 一、美国极右翼暴力相关概念和既有研究

在政治学研究中，“右翼”一般指政治系统中持各种保守立场的群体，“极右翼”则是指尝试将右翼的政治立场推向极端的群体。根据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极右翼一般包含厌女症者、反穆斯林、新法西斯、反移民、新纳粹、反伊斯兰、

---

[1] Peter Bergen, David Sterman, “Terrorism in America After 9/11,” *New America*, September 10, 2021, <https://www.newamerica.org/international-security/reports/terrorism-in-america/what-is-the-threat-to-the-united-states-today/>.

[2]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inaugural-address-by-president-joseph-r-biden-jr/>.

[3]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Domestic Terrorism,” *The White House*, June 2021, p.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National-Strategy-for-Countering-Domestic-Terrorism.pdf>.

反性少数群体 (LGBT)<sup>[1]</sup> 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等群体。<sup>[2]</sup> 而“极右翼暴力活动”则表现为持极右翼意识形态的群体针对非战斗人员实施暴力的活动。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研究与应对恐怖主义联盟 (START) 将极右翼暴力活动定义为：“支持如下信念——即个人或国家的生活方式正遭受攻击或已丧失、或威胁已迫在眉睫并由此产生的暴力”，其特点是“反全球主义，支持种族主义、民族至上主义，质疑联邦权威，尊崇个人自由，相信严重威胁国家主权、个人自由的阴谋论”。<sup>[3]</sup>

美国法典规定，国内恐怖主义是指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危害人身安全的一种犯罪行为，其目的是：恐吓或胁迫平民；以恐吓或胁迫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大规模破坏、暗杀和绑架的方式影响政府行为。<sup>[4]</sup> 尽管美国法典定义了恐怖主义，极右翼暴力活动也具有外界认为的浓厚的恐怖主义色彩，但因美国尚无国内恐怖主义法，很难对极右翼暴力活动做出法律上的裁定。为避免争议，本文使用“极右翼暴力”来描述出于某些政治动机而实施、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极端暴力活动。

从美国内战后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 3K 党，到上世纪 30 年代的纳粹组织，再到 70—80 年代兴盛的极端民兵组织活动和反堕胎暴力运动，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曾长期肆虐。“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与社会将矛盾焦点对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发起的暴力活动，极右翼暴力活动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然而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极右翼暴力的威胁开始重新显现。但直到拜登政府上台，美国才将反恐重点由国际恐怖主义转移到国内恐怖

---

[1] 是指在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身份或性行为等方面与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同的群体，同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等都属于性少数群体。

[2]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2020, p.61, <https://visionofhumani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11/GTI-2020-web-1.pdf>.

[3] “Countering Domestic Terrorism: Examining the Evolving Threat,” START, September 25, 2019, p.3, [https://www.start.umd.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local\\_attachments/START\\_HSGACTestimony\\_CounteringDomesticTerrorism\\_Braniff\\_09252019.pdf](https://www.start.umd.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local_attachments/START_HSGACTestimony_CounteringDomesticTerrorism_Braniff_09252019.pdf).

[4] “18 U.S. Code § 2331 - Definitions,” U.S. Code,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2331>.

主义方面，表现为美国彻底撤军阿富汗和国家层面《打击恐怖主义战略》的出台。那么，现阶段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呈现出哪些新态势？其为何再度兴起？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成为相关部门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整体来看，关于美国国内恐怖主义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恐怖活动的系统分析依然较少，并未对其给予充分重视或特别关注。<sup>[1]</sup>少数相关研究只是聚焦于极右翼暴力的某个类别，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类别的极端暴力活动。<sup>[2]</sup>更多的研究着重于讨论美国的右翼和极右翼政治而非暴力活动。<sup>[3]</sup>国外的相关研究更多是以新闻评价和报告的形式出现。<sup>[4]</sup>此外，当下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兴起的原因是多元的，大部分研究着眼于其兴起的技术因素（如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美国枪支文化的盛行与泛滥）、或受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如金融危机、奥巴马当选总统、新冠疫情暴发、特朗普连任败选、“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反疫情封锁等），但并未对极右翼暴力活动兴起最为根本的政治逻辑给予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尝试在介绍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其兴起的政治逻辑及其发展前景。

---

[1] 这些研究多将极右翼暴力活动视作美国国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或只关注极右翼暴力的某个层面。吴文聪：《美国国内恐怖袭击新态势与原因探析》，载《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李益斌、刘洋：《美国“独狼”的网络情报治理方案研究》，载《情报杂志》2022年第4期。

[2] 王伟：《21世纪美国白人极端主义现象研究》，载《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谢舒晔：《美国极右翼恐怖主义中的宗教极端思想研究》，载《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3] 刘艳：《美国“另类右翼”政治的兴起及其对华政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赵海、陈展：《美国极右翼信息生产与社会动员机制——以匿名Q运动为例》，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1期。

[4] 比较典型的包括 Seth G. Jones, “Seth G. Jones  $\Delta$  -Right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Briefs,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ise-far-right-extremism-united-states>; Robert O'Harrow Jr., Andrew Ba Tran and Derek Hawkins, “The rise of domestic extremism in America,”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interactive/2021/domestic-terrorism-data/>。

## 二、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的现状、类型与特点

从“9·11”事件至2020年，美国的极右翼暴力活动在数量上逐渐超过其他类型的恐怖活动，已演变为国内最具威胁的暴力活动（见图1）。在21世纪头10年，美国极右翼暴力事件的数量虽然有所增长，但整体尚未构成严重威胁。此后，特别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以来，极右翼暴力事件激增。其间，美国国内共发生705起恐怖袭击和未遂事件，其中极右翼暴力事件393起，致死141人，占比高达55.7%；极左翼暴力事件165起，占比23.4%；宗教极端暴力事件130起，占比18.4%。<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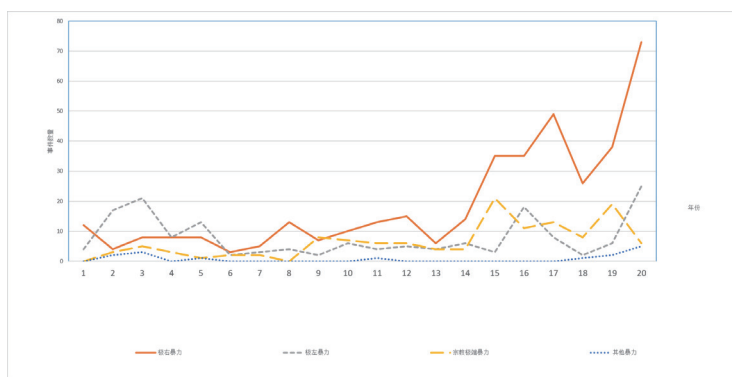


图1 “9·11”事件后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暴力事件<sup>[2]</sup>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数据绘制，[https://github.com/wpinvestigative/csis\\_domestic\\_terrorism](https://github.com/wpinvestigative/csis_domestic_terrorism)。

### （一）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类型

从意识形态看，美国极右翼暴力存在三大类别：白人至上主义、反

[1] 本文选择 CSIS 数据库的原因在于，首先该数据库最为全面，汇编和整理了多个数据库、政府报告和新闻等资料；其次，该数据库将密谋袭击失败的恐袭事件也纳入其中；第三，该数据库编码了袭击者的意识形态。数据来源见 Github，“csis\_domestic\_terrorism,” [https://github.com/wpinvestigative/csis\\_domestic\\_terrorism](https://github.com/wpinvestigative/csis_domestic_terrorism)。此外，尽管不同数据库中研究者对袭击者的动机会制定不同的标准，使得恐怖袭击的具体数量存在差异，然而极右翼分子发动袭击的基本趋势和粗略百分比在大多数研究中是一致的。

[2] 横坐标中 1、2、3、4 等分别代表 2001 年、2002 年、2003 年、2004 年，以此类推。

联邦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者虽在实施主体上时有重叠，但出于各自的意识形态差异，导致施暴重点不同。首先，白人至上主义者是实施极右翼暴力活动的主体。拜登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战略》指出：“当今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一个关键来源是具有种族或民族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和网络。”<sup>[1]</sup>其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威胁最为突出。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研究与应对恐怖主义联盟的一份报告显示，1948—2018年，美国65%的极右翼分子信奉白人至上主义。<sup>[2]</sup>美国总统拜登曾明确指出：“我们不会忽视情报机构评估的如今对美国最致命的恐怖主义威胁，白人至上主义即恐怖主义。”<sup>[3]</sup>对白人至上主义者追根溯源，3K党即为其鼻祖，该组织在美国内战后最早发起针对黑人的恐怖袭击。上世纪70年代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核心目标转变为：白人应支配其他族群，白人应独自生活在白人社会，白人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白人的基因更为优越。<sup>[3]</sup>美国人种正在发生“大置换”（The Great Replacement）的论调就广泛流传于该群体中，认为白人受犹太人、黑人、亚裔和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入侵”，已面临灭绝危机。因此，他们试图用暴力引发种族间的战争，最终推翻所谓的“犹太人统治”，并征服、驱逐或消灭其他“低等”族群。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2018年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2019年埃尔帕索沃尔玛枪击案及2022年布法罗枪击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置换”观点的影响。白人至上主义相关组织和运动除了3K党外，还包括新纳粹主义（Neo-Nazism）和“骄傲男孩”（Proud Boys）等。<sup>[4]</sup>

[1] “Profiles of Individual Radic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IRUS),” START, May 2020, p.2, [https://www.start.umd.edu/pubs/START\\_PIRUS\\_ResearchBrief\\_May2020.pdf](https://www.start.umd.edu/pubs/START_PIRUS_ResearchBrief_May2020.pdf).

[2] “‘White Supremacy Is Terrorism, Most Lethal Threat To America’: Joe Biden,” NDTV, April 29, 2021, <https://www.ndtv.com/world-news/us-president-joe-biden-says-white-supremacy-is-terrorism-and-most-lethal-threat-to-america-2424253>.

[3] “Confronting White Supremacy (Part I),” Anti-Defamation League, Congress, May 15, 2019, p.3, <https://www.congress.gov/116/chrgr/CHRG-116hhrg36512/CHRG-116hhrg36512.pdf>.

[4] 新纳粹主义仇恨犹太人，热爱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虽然他们也憎恨其他少数族裔、性少数分子、甚至基督徒，但将“犹太人”视为主要敌人。“骄傲男孩”组织大肆宣扬白人种族主义思想，以反穆斯林和厌恶女性的言论而闻名，并与已知的极端分子保持联系。参见“Extremists Groups,”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https://www.splcenter.org/fighting-hate/extremist-files/groups>。

其次，反联邦政府主义者的极端暴力威胁不容忽视。反联邦政府主义者以民兵暴力分子为主，其主体由部分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生存主义者组成，统称为“爱国者运动”。在理论上，所有恐怖活动都含有反对现有政权、反对现存法律秩序的意味，不过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等不同，反联邦政府主义者拒绝联邦权力的过度扩张。他们结合了反政府思想和准军事活动，认为美国抛弃了初创时的政治制度，精英阶层已把控了全部政治进程；联邦政府持续剥夺美国人的权利，对美国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构成最大威胁；美国人都应该学习准军事技能，以抵抗政府的“暴政”。上世纪70—80年代，反联邦政府主义者的极端暴力初现，他们实施武装对峙、谋杀和爆炸等暴力活动，当时的激进组织“骑士团”(Posse Comitatus)强烈反对枪支管制、税收和联邦政府。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本土恐袭——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便是反联邦政府主义者所为。2008年后他们的极端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并在2021年的“国会暴乱”事件中达到新高潮。其中“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主权公民”(sovereign citizen)和“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ers)等组织异常活跃。<sup>[1]</sup>

最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极端暴力威胁持续增加。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指在道德、宗教、性别、语言和教育等文化价值观层面持极端保守态度的人。上世纪60年代伴随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革命等一连串民权运动兴起，美国社会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自由主义之风日盛，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的传统价值观影响力日渐弱化。文化保守主义者深受基督教右翼思想影响，他们抗议平权运动后边缘群体权利的持续伸

---

[1]“誓言守护者”是一个美国极右翼民兵组织，主要由现役和退役美国军人、警察和相关拥护者组成。该组织认为联邦政府被一个试图剥夺美国公民权利的阴谋所控制。“主权公民”是一个由个体组成的松散网络，主张个体公民具备主权，不承认联邦、州或当地的法律、政策及法规。“百分之三”是民兵运动的一部分，认为联邦政府正在阴谋剥夺美国人的权利和自由，支持少数“爱国者”保护美国人免受政府暴政的想法。参见““Extremists Groups,”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 <https://www.splcenter.org/fighting-hate/extremist-files/groups>。

展，主张维护白人基督教传统价值观。这一群体包括了反堕胎、反平等、反性少数主义者，以及厌女症（misogyny）和非自愿单身群体（Incel）等。其中的极端分子主张对女性、宗教场所、堕胎机构和性少数群体等实施暴力。文化极端保守主义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有所重叠，如“骄傲男孩”等组织。但前者更强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后者更侧重种族属性的固有差异。比如，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多元文化扩张持异见，但他可能并不拥护种族意义上的白人至上主义。

## （二）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的特点

首先，极右翼暴力活动具有无组织、无领导和个体化的“独狼”色彩。一些袭击者虽然被划入“誓言守护者”“百分之三”和“骄傲男孩”等极右翼组织，也与它们存在交流，但大部分袭击者并无明确的组织归属<sup>[1]</sup>，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松散。实际上，“无领导的抵抗”（leaderless resistance）就是极右翼发明的概念，美国国内致命的极右翼暴力活动也多是“独狼”所为，例如，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2018年的匹兹堡犹太教堂袭击案、2019年的得州埃尔帕索枪击案等。浓厚的“独狼”色彩也增加了执法机构破获正在密谋的恐怖袭击案的难度。

其次，互联网是极右翼分子传播极端观点和策划暴力活动的重要平台。以往美国极右翼分子主要借助集会、纸质印刷品和电视广播等介质宣传极端理念。“9·11”事件后的近20年间，美国成年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比例由54%增加至90%。<sup>[2]</sup>随着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直播平台、文件上传网站和加密网站的快速发展，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和电报（Instagram）等平台都曾充斥着大量的种族主义、反政府和阴谋论

[1]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p.65.

[2] “DH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Targeted Violenc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ptember 10, 2019, p.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ontext/document-dhs-strategic-framework-for-countering-terrorism-and-targeted-violence/6ab1fa62-3f48-417b-8416-99ca255f5da7/>.



内容。极端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传播激进观点、获取资金、传授暴力策略、发布目标信息和协调行动等，加速了具有共同价值观群体的激进化过程。在“国会暴乱”事件中，极端分子更是广泛利用社交平台策划袭击，加之暗网、加密和匿名技术的升级，极端分子可通过特殊语言符号、游戏聊天服务等发送和接受加密信息，使极端言论和恐袭密谋更加难以追踪。

再次，现役或退役军人参与极右翼暴力活动的比例惊人。据统计，美国1972—2015年间的“独狼”恐袭者中37%曾在军队服役。<sup>[1]</sup>美国国防部也警告说，一些国内的极端和恐怖组织正在积极招募军人，以利用他们的战斗和战术经验。<sup>[2]</sup>许多臭名昭著的暴力袭击事件也正是由退伍军人实施的，例如，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炸死168人、炸伤680人，其实施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于1988年入伍，曾参与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2012年退伍军人韦德·迈克尔·佩奇（Wade Michael Page）在威斯康星州的锡克教寺庙杀害6人。目前，在被控参与“国会暴乱”的845人中多达101名具有从军经历。<sup>[3]</sup>而那位在“议长大厅”试图破窗而入、最终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女性暴乱分子也是一名曾经服役14年的老兵。

最后，极右翼暴力活动的袭击对象与其意识形态高度相关。在理论上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应针对其意识形态所框定的反对目标，从而明确地“打击”锁定目标。但由于被袭击对象时常难以从生理上精确区分，加之长期以来

---

[1] “More right-wing terrorism in the U.S.—but fewer deaths,” katapult-magazin, April 20, 2021, <https://katapult-magazin.de/en/article/more-right-wing-terrorism-in-the-u-s-but-fewer-deaths>.

[2] “Report to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s on Screening Individuals Who Seek to Enlist in the Armed Forces,”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ersonnel and Readiness, June 2020, p.6,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Mar/02/2002592042/-1/-1/0/REPORT-TO-ARMED-SERVICES-COMMITTEES-ON-SCREENING-INDIVIDUALS-WHO-SEEK-TO-ENLIST-IN-THE-ARMED-FORCES.PDF>.

[3] “Capitol Hill Siege,” GW Program on Extremism, July 21, 2022, <https://extremism.gwu.edu/Capitol-Hill-Siege>.

在圣战暴力袭击中死亡的主要是穆斯林群体，恐怖主义给人们留下了不加区分袭击平民的残暴印象。与此不同的是，美国极右翼暴力的袭击对象与其意识形态目标紧密挂钩。近20年来，在美国发生的极右翼暴力事件中，有23%（87起）针对宗教机构，17%（64起）针对政府机构、军队和警察，9%（36起）针对支持堕胎的目标。在针对个人的108起事件中，约76.8%（83起）有明确动机，包括主张白人至上、反穆斯林、反犹太人、反亚裔、反“黑人的命也是命”等。<sup>[1]</sup>这反映了美国极右翼暴力主要是针对“少数族裔”“自由主义价值观群体”和“政府”，明确地向外界传达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

### 三、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兴起的政治逻辑

极右翼暴力的幽灵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历史之中。2008年后，极右翼暴力活动开始缓慢增多，并在近10年呈激增态势。当前，美国正处于新一轮由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剧变而驱动的国家大转型中，这是极右翼暴力兴起的宏观背景；美国的政治极化与僵化导致右翼派别分裂和极端化，这是其兴起的中观机制；美国反恐战略重心长期聚焦国际恐怖主义及共和党长期庇护极右翼势力，是其兴起的促动因素。

#### （一）极右翼暴力活动兴起的宏观背景：美国国家大转型

右翼保守势力是美国建国以来便存在的一股重要政治势力。2008年以后极右翼暴力兴起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身处美国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深刻的国家转型之中。其中的核心议题是：美国应如何确定自身的定位和功能，以调适国家与市场、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关系。具体而言，在经济层面，美国如何平衡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政治层面，美国需要在扩大联邦权力与回归小政府之间进行取舍；在社会文化层面，美国是奉行左

---

[1] 数据来源：[https://github.com/wpinvestigative/csis\\_domestic\\_terrorism](https://github.com/wpinvestigative/csis_domestic_terrorism)。

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抑或重返白人基督教传统。极右翼暴力运动的兴起便是在美国国家大转型过程中试图重塑美国前进方向的一种极端反弹或回应。

首先，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社会贫富分化，右翼保守派的经济地位严重下滑。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面对西方大规模经济滞胀时失灵。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采取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自由、阻挠劳工谈判和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等举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方面在加速全球化、金融化和技术革命，一方面也急剧降低了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和工业人口比例<sup>[1]</sup>，白人劳工群体的选民比例持续萎缩。<sup>[2]</sup>同时，新自由主义通过工资、税收、产业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及教育制度，助长了美国的贫富差距<sup>[3]</sup>，因此引发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特朗普则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两人都试图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由于白人的经济地位存在由高到低的历史落差，而少数族裔则相对的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经济的边缘，因此白人中产和劳工阶层的落差感更加强烈。制造业衰退和经济地位下降，引发吸毒泛滥、犯罪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自杀激增和单亲家庭增多等大量社会问题；失业从非裔等少数族群传导到白人

[1] 1953—2015年，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由28.1%下降至12%，制造业的就业份额由32%下降至8.7%。YiLi Chien and Paul Morris, “Is U.S. Manufacturing Really Declining?” St. Louis Fed, April 11, 2017, <https://www.stlouisfed.org/on-the-economy/2017/april/us-manufacturing-really-declining>。

[2] 1975—2018年，白人劳工占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由70%降低至40%。William R. Emmons, Ana Hernandez Kent and Lowell Ricketts,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National Trends, Then and Now,” St. Louis Fed, September 24, 2019, [https://www.stlouisfed.org/on-the-economy/2019/september/white-working-class-national-trends-then-now?utm\\_source=Federal+Reserve+Bank+of+St.+Louis+Publications&utm\\_campaign=3306d0d071-BlogAlert&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c572dedae2-3306d0d071-57468989](https://www.stlouisfed.org/on-the-economy/2019/september/white-working-class-national-trends-then-now?utm_source=Federal+Reserve+Bank+of+St.+Louis+Publications&utm_campaign=3306d0d071-BlogAlert&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c572dedae2-3306d0d071-57468989)。

[3] 李文：《美国人为什么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如何加剧美国社会两极分化》，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33期，第124—125页。

中产和劳工阶层，引发他们强烈的焦虑和不安情绪。

其次，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联邦政府权力的持续扩张引发右翼的抗议。在罗斯福新政、冷战加持、“9·11”事件的冲击以及福利国家建设的推进下，联邦政府的权力正在全方位、深层次地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但不限于联邦政府部门、雇员人数和开支的猛增，央地关系中联邦权力的扩大，三权分立中总统权力中心地位的确立，安全和情报机构对公民的监控，对外战争的权力膨胀，移民制度改革等。然而，右翼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于国家干预或者“大政府”具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和敌视，他们坚信国家权力过大将使其走向独裁和暴政。早在罗斯福新政实施不久，右翼团体便在1937年12月第一次系统表达了充满反政府政治哲学理念的“保守主义宣言”（conservative manifesto），包括谴责工会的静坐罢工、呼吁降低联邦税收和平衡预算、捍卫各州权力、谴责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管等。<sup>[1]</sup>此后，激进右翼势力在平权运动、反联邦运动、“茶党运动”以及“国会暴乱”等活动中一直保持强大的影响力。

最后，在国家认同上，美国当下饱受“种族国家”与“公民国家”两种身份对立的煎熬，右翼保守派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从制度上保护了曾长期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女性、少数族裔和移民等群体的权利，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国信条”开始得以在不同种族中真正践行。伴随着进步主义的高歌猛进，“自由”和“平等”原则被少数进步派群体绝对化。他们高举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甚至将之视为美国价值观的最高准则，与以白人清教徒的传统价值观为基石的“种族国家”认同产生了激烈碰撞。早期，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著的《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当代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撰写的《我们是谁》中，两位学

---

[1] D. J. Mulloy, *Enemies of the State: The Radical Right in America from FDR to Trump*,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18, pp.24-25.

者都表达了对美国种族结构变化及其引发的认同冲突的焦虑。<sup>[1]</sup>随着白人经济地位的衰落及人口比例下降趋势变得不可逆，以及民主党不断迎合少数族裔诉求的“政治正确”，右翼保守派日益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受到强烈冲击并遭受“反向歧视”，以至于沦为北美大陆这片故土上的“陌生人”。<sup>[2]</sup>

目前，美国本轮国家大转型正遭遇巨大的挫折。当下，美国面临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国家三种国家特性的冲突困境。<sup>[3]</sup>其国内矛盾包括短期的社会运动、中期的自由调节与政府干预，以及长期的同质性“建国者”与异质性“接续者”的结构性矛盾。<sup>[4]</sup>公民民族主义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和族群民族主义的“例外”(exceptional)国家正激烈碰撞。<sup>[5]</sup>在此背景下，左翼的不满主要聚焦在经济领域，因为他们在文化、福利政策方面获利相对较多。然而，右翼保守派群体认为自身在美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传统优势地位正在被全方位侵蚀，因此极右翼分子试图重塑美国的发展方向。他们一方面抵制其他群体在人口结构和价值观上的“入侵”(此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不满动机)；一方面将矛头直指联邦政府，认为“大政府”在经济上推广自由贸易、给边缘群体增加社会福利的行为，以及文化上对自由派的包容性政策，是破坏传统就业、造就白人社会困境的罪恶来源(此为反联邦政

---

[1] [美]小阿瑟·M. 施莱辛格：《美国社会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王聪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美]亨廷顿：《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 [美]阿莉·霍赫希尔德：《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夏凡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3] 周少青：《美国国家特性的三重面相及当代困境》，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1期，第9—39页。

[4] 任剑涛：《重构国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论推定》，载《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3期，第54页。

[5] 谢韬：《美国大转型：从“例外”国家到民族国家》，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第107—115页。

府主义者不满的根源)。在美国国家大转型背景下,当下的极右翼暴力不仅具备美国历史上右翼运动的所有精神内核,如反对大政府、民权运动、福利国家和自由贸易等政策,而且其激烈程度也是近几十年内所未有的。

## (二) 极右翼暴力活动兴起的中观机制: 右翼派别分裂与极端化

冷战期间基于共同的外部威胁,温和的保守派民主党和自由派共和党都能超越本党利益,以美国国家利益的大局为重,推动两党共识落地。冷战后,国会集权改革与地方直接初选制导致两党向左右翼光谱的两端移动<sup>[1]</sup>,反映在总统选举上,过去7次选举的结果均取决于少数几个摇摆州,显示出严重的“红蓝对立”。<sup>[2]</sup>围绕经济、种族、疫情防控、社会福利、气候变化和国际参与等议题,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达到历史之最。两党的极化严重削弱了政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造成政治僵化和“否决政治”的出现。2000—2020年,国会每年提出的议案和联合决议案由3000多件增加至5117件,但每年生效的法案由200多件锐减至28件。<sup>[3]</sup>因此,从“医保改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气候协定”到“旅行禁令”等,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多以“总统令”形式出现,亦不可避免地产生换届与政策更迭同步的困境。

两党共识的消散使得右翼保守派的种种诉求难以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得以解决。右翼选民内部本就存在差异。其中,温和右翼主张从文化角度复兴盎格鲁-萨克逊的新教文化;福音派保守右翼则从基督教传统出发,

---

[1] 王格非:《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前美国政治困境及原因》,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3期,第84页。

[2] Lee Drutman, “How Much Longer Can This Era of Political Gridlock Last?” Five Thirty Eight, March 4, 2021,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how-much-longer-can-this-era-of-political-gridlock-last/>.

[3] 未包含不具法律效力的简单决议案和共同决议案。Neal Rothschild, “Productivity in Congress tanked in 2020,” Axios,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axios.com/congress-legislation-covid-19-2020-28a81b79-8cfc-4fc6-8fa6-e1758dd5f81f.html>.

主张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对美国进行全方位改造；极右翼则利用这种焦虑甚至恐惧的情绪提出“重返白人国家”的激进主张。<sup>[1]</sup>在此基础上，政治极化造成的政治僵化进一步加剧了右翼选民之间的分裂和极端化。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右翼保守群体强烈感受到以白人男性中产、基督教文化和由异性恋主导的美国已“摇摇欲坠”，因此“茶党运动”作为对共和党主流幻想破灭的结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蔓延至美国各地，成为保守派发泄不满的重要途径。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也可以看作右翼保守派选民在政治体制内进行抗争的一种尝试。然而，上述政治渠道并未有效地处理他们的诉求。79%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利于偏保守的民众。<sup>[2]</sup>此外，随着知识界和新闻媒体的大幅左转，他们与保守派的立场逐渐对立，加之媒体往往对极右翼暴力大肆宣扬，对极左翼暴力却闪烁其词，导致温和右翼保守派的诉求既不能通过政治渠道解决，也无法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进而加剧了右翼群体的仇恨心态和内部分裂与极端化。当前，偏保守和极端保守的选民从1972年占选民总数的11%增长至2020年的23%。<sup>[3]</sup>

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协商、非制度化的示威行动，到领导人的大声疾呼及非暴力的对抗活动，这些政治行动都未能弥合或缓解美国内部愈演愈烈的分裂，也未能有效缓解右翼群体的积怨。囿于和平的抗争手段效果不佳，随着温和派与建制派逐渐失势，偏保守派的力量持续增强，抗争政治逐渐滑向另一端——极右翼群体使用暴力手段来逆转自身权利和地位下

---

[1] 周少青：《美国国家特性的三重面相及当代困境》，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1期，第28—29页。

[2] Daniel A. Cox, “After the ballots are counted: Conspiracie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merican survey center, February 11, 2021, <https://www.americansurveycenter.org/research/after-the-ballots-are-counted-conspiracies-political-violence-and-american-exceptionalism/>.

[3] “Liberal-Conservative Self-Identification 1972-2020,”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https://electionstudies.org/resources/anes-guide/top-tables/?id=29&id=29>.

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暴力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合理手段。<sup>[1]</sup>奥巴马政府时期，“爱国者运动”和反政府民兵武装数量由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最高每年171个激增至最高时每年1360个。<sup>[2]</sup>2020年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失利后，右翼保守派失去了“代言人”，在美国言论宽松与枪支泛滥的环境下，其抗议活动趋向暴力化，最终演变为震惊世界的“国会暴乱”事件。此后，仅2020年5—10月，全美约发生了671次暴力活动，其中至少有17次造成人员伤亡。<sup>[3]</sup>

### （三）联邦政府未给予足够重视是极右翼暴力兴起的促动因素之一

美国长期聚焦全球“圣战”的威胁，对国内极右翼暴力的关注和打击程度严重不足，使得极右翼暴力在宽松的环境下野蛮生长。反恐20多年来，美国政府将主要精力投放于国际恐怖主义，虽然发表过多份“国家反恐战略”，但对国内恐怖主义多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仅2018年版的《国家反恐战略》承认国内恐怖活动有增长之势，但对极右翼暴力的威胁轻描淡写。<sup>[4]</sup>在法律层面，美国关于国内恐怖主义的相关法律亦不够完善，美国法典规定的50多项恐怖主义罪行多为国际恐怖主义而定<sup>[5]</sup>，几乎未考虑国内极右翼暴力的情形，如未授权认定国内实体为恐怖组织，也不含极右翼暴力的常见类型——大规模枪击案。除非施暴者与外国“圣战”网络有明确关联，否则执法部门缺乏法律依据，极右翼暴力最终多被归类为严惩几率很低的

---

[1]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p.66.

[2] Nick Fouriezos, “the rise of american militias,” OZY, September 6, 2020, <https://www.ozy.com/true-and-stories/the-rise-of-american-militias-from-timothy-mcveigh-to-kyle-rittenhouse/376826/>.

[3]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0,” p.66.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 2011, p.18,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counterterrorism\\_strategy.pdf](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counterterrorism_strategy.pdf);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 The White House, 2018, p.10, <https://www.dni.gov/files/>.

[5] “18 U.S. Code § 2332b – Acts of terrorism transcending national boundaries,” Cornell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2332b#g\\_5](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2332b#g_5).



仇恨犯罪。<sup>[1]</sup>此外，相较国际反恐调查，国内反恐调查存在额外程序，需经过法院批准才可使用国家安全信函，且需得到法律顾问的批准；调查涉及长期和特别线人时，还需得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律师特别委员会的批准。<sup>[2]</sup>

由于对国内恐怖主义和极右翼暴力重视不足，美国政府对其所投入的资源也相对有限。在资金投入上，以2016年为例，美国国土安全部年度预算高达400多亿美元，但仅为授权地方社区预防极端主义的“社区伙伴办公室”拨款2100万美元。<sup>[3]</sup>在人力配置上，联邦调查局负责监控和调查极端组织和恐怖活动，但雇员人数只及国土安全部<sup>[4]</sup>的1/8<sup>[5]</sup>，其反恐部门长期仅有约1/5的人员应对国内恐袭活动。<sup>[6]</sup>因此，美国针对国内恐怖主义分子的数据资料有限。例如：联邦调查局建立的恐怖分子筛查数据库中约有100万人，其中99.5%为外国人；2001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针对恐怖嫌疑分子的“禁飞名单”，这些人将被禁止乘坐商业客机在美国旅行

---

[1] 过去十年里，移交给联邦当局的仇恨犯罪被起诉的比例仅有15%。“‘They’re Fighting Blind,’ Insid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Uphill Battle Against Far-Right Extremism,” Time, March 4, 2021, <https://time.com/5944085/far-right-extremism-biden/>.

[2] Shirin Sinnar, “Question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 Biden’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July 26, 2021, <https://www.justsecurity.org/77557/questioning-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in-bidens-counterterrorism-strategy/>.

[3] George Selim, “Testimony before the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 House, May 15, 2019, p.8,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GO/GO02/20190515/109478/HHRG-116-GO02-Wstate-SeliumG-20190515.pdf>.

[4] 国土安全部雇员高达数十万，工作重点为保护美国的边境、港口、运输和网络系统，即防范国际恐怖主义。

[5] “The agency founded because of 9/11 is shifting to face the threat of domestic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4,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dhs-domestic-extremism-threat/2021/02/14/41693dd0-672f-11eb-bf81-c618c88ed605\\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dhs-domestic-extremism-threat/2021/02/14/41693dd0-672f-11eb-bf81-c618c88ed605_story.html).

[6] “FY 2009 Congressional Budget Submission,”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08, pp.6-18, <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jmd/fy-2009-congressional-budget-submission>.

或进出美国。截至2016年，该名单上共有约8.1万人，其中美国公民不足1000人。<sup>[1]</sup>在对恐袭活动防范方面，美国国内2/3的伊斯兰极端暴力阴谋能够在发生前被破获，但极右翼暴力活动的相应比例不足1/3。<sup>[2]</sup>

#### （四）共和党的持续庇护是极右翼暴力活动兴起的另一促动因素

共和党保守势力一直对极右翼暴力持庇护态度，这鼓舞了极右翼分子的嚣张气焰。早在2009年右翼势力和极右翼群体兴起之时，国土安全部就己捕捉到极右翼暴力威胁的上升迹象。该部高级分析师达里尔·约翰逊(Daryl Johnson)在报告中指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独狼”活动构成了最突出的国内暴恐威胁，经济衰退和非裔总统当选加速了右翼的激进化，极右翼分子也试图招募和激进化退伍军人。<sup>[3]</sup>但该报告尚未公布便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共和党政客将之引导为对军人的刻意指责。在共和党的压力下，国土安全部撤销了该份报告，部长对外致歉，约翰逊本人则被辞退，其关注国内非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的团队随即被解散。该事件造成了深远的“寒蝉效应”。在两党格局下，奥巴马政府对极右翼暴力活动展开调查颇存忌惮。在2011年出台的“防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新战略”中，所谓的“本土暴力极端分子”仅指向了穆斯林群体。<sup>[4]</sup>对于国内恐袭和极右翼暴力活动持续增加的趋势，国家情报总监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等都曾在国会证词中予以强

---

[1] “Feinstein Statement on Collins Amendment,” Office of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June 23, 2016, <https://www.feinstein.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ID=F02871C5-A023-4DEF-AEC3-EDAF34BEA2BF>.

[2] Cynthia Miller-Idriss, “From 9/11 to 1/6, The War on Terror Supercharged the Far Right,”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24/war-on-terror-911-jan6>.

[3] “Rightwing Extremism:Cur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limate Fueling Resurgence in Radicalization and Recruitment,”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pril 7, 2009, pp.2-7, <https://irp.fas.org/eprint/rightwing.pdf>.

[4]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Empowering Local Partners to Prevent Violent Extremism Strategy in the United State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2011, <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694059>.

调<sup>[1]</sup>，但均未得到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响应。

特朗普执政后更加明目张胆地庇护极右翼暴力。一方面，在威胁认知上，特朗普刻意淡化极右翼暴力的威胁，对于情报机构关于“白人至上主义”的警告<sup>[2]</sup>置若罔闻，无视国会提交“全面、跨机构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战略”的要求<sup>[3]</sup>，并拒绝加入打击网络仇恨言论的国际合作。对于2017年夏洛茨维尔暴乱事件中的极右翼集会者、2019年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特朗普也竭力淡化施暴者的身份属性和施暴动机。另一方面，在国内反恐政策上，特朗普刻意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混为一谈，削减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对极右翼暴力的资源投入。例如，特朗普政府加强对穆斯林和少数族裔的监控、实施“禁穆令”、修建美墨边界墙和推行驱逐非法移民等长期主张。同时，特朗普政府对专注打击国内极端暴力的机构进行调整，削减它们的经费和人员支持。<sup>[4]</sup>多个数据库因强调极右翼暴力威胁（如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被取消了项目资助。

---

[1] Mueller, Robert S.,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May 16, 2012, [https://archives.fbi.gov/archives/news/testimony/oversight-of-the-federal-bureau-of-investigation-4;Clapper, James R., “Unclassified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on the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for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anuary 31, 2012,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Testimonies/20120131\\_testimony\\_ata.pdf](https://archives.fbi.gov/archives/news/testimony/oversight-of-the-federal-bureau-of-investigation-4;Clapper, James R., “Unclassified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on the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for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anuary 31, 2012,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Testimonies/20120131_testimony_ata.pdf).

[2] “White Supremacist Extremism Poses Persistent Threat of Lethal Violence,” Joint Intelligence Bulletin, May 10, 2017,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3924852-White-Supremacist-Extremism-JIB.html>.

[3] Eric Rosand, “When Fighting Domestic Terrorism,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1/01/when-fighting-domestic-terrorism-you-get-what-you-pay-for-antisemitism-far-right-countering-violent-extremism-jihadists/>.

[4] “Peters & Johnson Initiate Bipartisan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 Inquiry into Federal Resources and Policies to Combat Domestic Terrorism,” Homeland Security & Governmental Affairs, May 8, 2019, <https://www.hsgac.senate.gov/media/minority-media/peters-and-johnson-initiate-bipartisan-homeland-security-committee-inquiry-into-federal-resources-and-policies-to-combat-domestic-terrorism>.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还拒绝使用“右翼恐怖主义”一词，拒绝将极右翼分子的杀戮行为称为“国内恐怖主义”。

特朗普总统及共和党政客的庇护态度不仅鼓舞了极右翼势力，也严重扰乱了安全和情报部门的正常工作。在政治压力下，情报部门投鼠忌器，联邦调查局忌惮对白人至上主义者进行全面调查。联邦调查局前主管戴夫·戈麦斯(Dave Gomez)称“特工们不愿意对总统视为选民基础的目标展开调查”。<sup>[1]</sup>因此，联邦调查局虽曾接到大量可疑恐袭事件的报告，却未制定应对之策。<sup>[2]</sup>安全部门也将大量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少数其他族裔实施的极端暴力统称为“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以弱化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

#### 四、美国极右翼暴力的发展趋势

面对极右翼暴力的兴起态势，拜登政府发布2021年《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这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首次制定应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拜登政府从反恐治理的多个环节提出了四个应对战略支柱：获取和共享其信息、预防其招募和动员、瓦解和制止其活动、根除其生存土壤等。<sup>[3]</sup>该战略力图在增强国内反恐能力建设之余，将打击极右翼暴力与种族主义、经济发展和枪支控制等社会议题相联系，实现标本兼治。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也据此战略不断地强化相关反恐行动：在立法上，民主党竭力推动国内恐怖主义法案和控枪法案的立法；在行政上，联邦政府

---

[1] Devlin Barrett, “FBI faces skepticism over its efforts against domestic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4,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fbi-faces-skepticism-over-its-anti-domestic-terror-efforts/2019/08/04/c9c928bc-b6e0-11e9-b3b4-2bb69e8c4e39\\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fbi-faces-skepticism-over-its-anti-domestic-terror-efforts/2019/08/04/c9c928bc-b6e0-11e9-b3b4-2bb69e8c4e39_story.html).

[2] “Audit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s Efforts to Identify Homegrown Violent Extremists through Counterterrorism Assessment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March 4, 2020, [https://oig.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s/a20030\\_0.pdf](https://oig.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s/a20030_0.pdf).

[3]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Domestic Terrorism,” pp.15-29.

加入打击极端言论的国际“基督城呼吁”（Christchurch Call）<sup>[1]</sup>，国土安全部首次将反“国内暴力极端主义”指定为优先方向，增加国内反恐经费，并考虑监控国内极端分子的旅行；在司法上，司法部正在调整审查恐怖主义案件的标准；在社会领域，各个社会组织不断促进跨派系对话等。但也应看到，拜登政府的国内反恐战略虽然雄心勃勃却面临重重挑战。未来美国国内的极右翼暴力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发展态势。

### （一）极右翼暴力将对美国构成长期威胁

当下拜登政府的反恐进展主要集中在对反恐威胁认知的调整和执法能力建设上，例如，将反恐重点从海外转移至国内，提升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对国内反恐的关注。然而在美国国家大转型背景下，要从根源上治理社会问题，以预防极右翼势力的动员和招募，以及获取恐怖主义的信息等，拜登政府恐力有不逮。

首先，拜登政府的国内反恐战略缺乏对右翼诉求的整体考量。经过美国内战、平权运动以后，“美国信条”得以真正地在不同族群中践行，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逐渐实现从“种族国家”到“公民国家”的完善。然而，“美国信条”理念得以推行的时代背景是白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享有绝对优势，尤其是在种族结构上占据多数。随着白人中产和劳工的种种优势逐渐遭遇挑战，族裔关系紧张和危机便凸显出来，并与联邦政府权力的持续扩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难以为继等因素叠加。这导致当下美国的国家转型危机并非集中在国家认同这个单一维度上，也非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循环》<sup>[2]</sup>一书中所说的从“自由”到“公平”的再度摇摆，而是全面地规划美国国家的定位与功能，确定适应当下美国经济社会现状的前进方向。

---

[1] “基督城呼吁”是一个由120多个政府、在线服务提供商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网络社区，致力于消除网络上的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相关内容。

[2]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pp.23-48.

目前，拜登政府并不具备重塑美国的能力和时机，其国内反恐政策也缺乏对右翼诉求的包容。对于拜登政府而言，想要重振国内制造业、调解族群间关系、弥合不同价值观的分歧和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其时间上的紧迫性和议题的艰巨性不言而喻。然而，拜登所主导的联邦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其一，执政仅百天拜登政府便抛出总额以万亿计的“2021 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 of 2021）、“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和“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y Plan），三大计划旨在刺激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经济结构。然而，被拜登政府寄予厚望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实现迅速助推经济复苏的目标之前，却先行引发了美国 40 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sup>[1]</sup>此外，无论是对富人增加赋税还是对穷人扩大补贴，都无益于解决左右翼劳工所提出的提振经济结构内生动力的诉求。在解决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上，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拜登政府在基建领域和芯片领域的各项经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国再现制造业辉煌令人怀疑。其二，拜登政府并未认真回应右翼保守势力的诉求，仍在延续“向左”的趋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拜登政府的疫情纾困方案正向“福利国家”的大政府模式靠拢。在价值观上，21 世纪女性主义者、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等实现了“平权运动”的升级换代，在全球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拜登政府不断迎合上述群体的偏好，继续走“政治正确”路线，甚至做出激怒右翼保守派的姿态，如公开庆祝“全国出柜日”（National Coming Out Day）。

其次，拜登政府治理极右翼暴力运动的政治方略持续面临共和党的阻碍。当下的极右翼暴力源自美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多重困境，因此国内反恐治理需要两党首先在政治上协商一致，向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靠拢，但在短期选举利益的考量下，两党政治斗争始终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9·11”事件后，共和党持续加强安全机构的权力，民主党则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由

---

[1]《美国面临 40 年来最严重通胀，全球经济复苏迎“逆风”》，网易网，<https://www.163.com/dy/article/HL3LU21T0514DG98.html>。

予以坚决反对。如今，两党关于反恐立法和执法的态度掉转——拜登在就职典礼上承诺打击极右翼暴力后，便遭到共和党议员、美国福克斯新闻等右翼保守派的口诛笔伐。<sup>[1]</sup>两党甚至对“国会暴乱”事件的定性都争执不断，共和党曾强烈阻止设立调查该事件的独立委员会。2022年众议院通过谴责特朗普“种族主义言论”的决议时，全体共和党众议员予以反对。对于拜登的控枪计划，共和党保守派官员不断做出抗议姿态，其大部分选民也拒绝让渡传统的持枪权利。两党甚至不再保持基本的政治克制，由保守派大法官主导的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此次裁决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已经认定为宪法保护权利的推翻，也是首次废除一项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权利；同时民主党不断在政治上对特朗普进行清算，联邦调查局于2022年8月8日突击搜查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在目前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只有民主党获得绝对权力并推行温和的中间路线，才能扭转美国政治极化的进程。<sup>[2]</sup>

最后，美国现行的反恐法律不能满足国内反恐需要。目前，美国庞大的枪支存量对社会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根据“小型武器调查”机构的数据，美国平民持枪数量达3.93亿支，其中已登记的枪支仅100万余支，剩余3.92亿支枪均未登记。<sup>[3]</sup>尽管当前美国社会关于制定国内恐怖主义法和枪支管控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受到民权组织、枪支协会和当下政治环境的影响，任何激进的立法呼吁都难以落地。例如，2022年5月，众议院已通过的《2022年国内恐怖主义预防法案》（Domestic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22）因共和党作梗在参议院搁浅。众议院通过的控枪议案《保护我们的孩子》

---

[1] “A 2009 warning about right-wing extremism was engulfed by politics,” USA today, January 25, 2021,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investigations/2021/01/25/twelve-years-before-capitol-riot-warning-right-wing-extremism-buried/6658284002/>.

[2] Francis Fukuyama, Path to Depolarization, Persuasion, Persuasion, August 3,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fukuyama-paths-to-depolarization>.

[3] “Global Firearms Holdings,” Small Arms Survey, <https://www.smallarmssurvey.org/database/global-firearms-holdings>.

(Protecting Our Kids Act) 获得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十分有限，预计未来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内容也将大大缩水。<sup>[1]</sup>

## （二）极右翼思想及其暴力偏好不断渗透至主流社会

随着美国社会分化和两党极化，温和中间派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极右翼思想及其暴力偏好已超越少数激进化个体，蔓延至右翼主流社会和党派、政府层面。许多媒体和政客都在公开宣扬“大置换”论调。共和党还利用极右翼势力的壮大捞取政治资本，如共和党议员公开宣扬对政府官员甚至总统施暴<sup>[2]</sup>，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试图否决建立调查“国会暴乱”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谴责支持民主党决议的两位共和党议员，并将事件参与者粉饰为“表达合法政治话语的普通公民”。<sup>[3]</sup> 极端暴力也正在获得主流民意不同程度的认可。一项 2000 人的随机调查估计，约 2100 万美国人认为“拜登是非法总统”，接受“使用暴力帮助特朗普重获总统宝座”。<sup>[4]</sup> 在参与“国会暴乱”事件的 845 人中，分别来自于美国 46 个州，参与者年龄 18—80 岁不等，其中只有 68 人（8.05%）属于激进分子网络，其余成员均不属于任何激进组织。<sup>[5]</sup>

---

[1] 如未包括如下重要条款：“危险信号法案”的法律机制，暂时没收被法院视作危险分子的人的武器；审查 21 岁以下枪支购买者的青少年犯罪和心理健康记录；禁止枪支走私和代买枪支；加强精神疾病的应对；阐明获得联邦许可的枪支经销商的定义，并打击非法逃避许可要求的犯罪分子；禁止被认定有家庭暴力问题的人购买枪支。“Factbox: What’s In, What’s Out of the US Senate’s Gun Safety plan,”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whats-whats-out-us-senates-gun-safety-framework-2022-06-12/>。

[2] Colin P. Clarke, “Jan. 6 Didn’t Set Off A Wave of Right-Wing Terrorism. Here’s What Happened Instead,” Politico, January 6, 202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2/01/06/far-right-extremists-jan-6-domestic-terrorism-526505>。

[3] “RNC resolution to censure Cheney, Kinzinger,”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4,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ontext/rnc-resolution-to-censure-cheney-kinzinger/cf48ebbc-aeb2-42c2-9a6b-3802186203e3/>。

[4] Robert A. Pape, “The Jan. 6 Insurrectionists Aren’t Who You Think They Ar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6,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06/trump-capitol-insurrection-january-6-insurrectionists-great-replacement-white-nationalism/#>。

[5] “Capitol Hill Siege,” GW Program on Extremism, July 21, 2022, <https://extremism.gwu.edu/Capitol-Hill-Siege>。



极右翼思想的主流化将增强右翼极端分子的声势：在政治上，将营造容忍甚至鼓励暴力的氛围，从而助长其嚣张气焰；在经济上，可能获得更多右翼选民的物质或资金支持；在情报支持上，更易获得右翼人群提供的庇护环境和不对称优势。<sup>[1]</sup>伴随着温和保守派与极右翼之间界限的模糊、施暴者由激进化个体向普通美国人扩散，恐怖主义和极端犯罪、仇恨犯罪、浑水摸鱼者等同流合污。这使得政府精准打击极右翼暴力变得更加困难，急剧抬高社会失序的风险。美国著名学者芭芭多·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认为，美国已具备发生内战的两个重要条件——强调身份政治的民主主体制与逐渐衰落的主流群体。<sup>[2]</sup>

### （三）极左翼暴力与极右翼暴力恐引发冲突螺旋

当下，美国左右翼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两者在身份政治中彼此攻讦，相互指责对方动摇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将自身困境归咎于对方及其政党。极右翼群体基于历史视角，强调美国的族群共同体特征，忧虑自身相对处境的下滑。在经济社会地位层面，他们认为白人丧失传统主导地位，强调少数族裔群体的经济贫困源于其历史文化和种族特性，而非客观条件的不公正，扩大社会福利只能助长其惰性。在价值观层面，极右翼群体认为左翼在文化上过于放纵，臆想回到盎格鲁-萨克逊白人享有特权的美国。与之相反，极左翼群体则从当下社会格局的相对视角出发，偏重美国政治共同体色彩，认为少数族裔仍在美国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并对绝对处境的劣势表示不满。在经济社会地位层面，他们抱怨自身获得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机会有限。在价值观层面，极左翼群体高举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大旗，甚至有意将之推向极端的身份政治，并批判右翼保守派摧

[1] 相关理论分析参见武兵科：《认知、能力与国内恐怖主义运动的演化——以印度旁遮普邦和印控克什米尔的暴力恐怖活动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第74—75页。

[2] Barbara F. Walter, *How Civil Wars Start: And How to Stop Them*, Crown, 2022; Stephen Marche, *The Next Civil War: Dispatch from the American Future*, Avid Reader Press, 2022.

毁了二战后美国形成的多元核心价值。在美国经济整体陷入缓慢增长的背景下，左右翼的相互指责加速社会割裂，并助推彼此滑向光谱更极端的一侧。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对此表示，“极端主义在各种政治派别中大幅抬头”。<sup>[1]</sup>

由于政治妥协机制受阻，左右翼的极端分子利用暴力操控抗争方向（见图1）。“9·11”事件以后，极左翼暴力事件数量虽然较少，但也与极右翼暴力亦步亦趋。近年来，极左翼暴力和极右翼暴力的相互激化尤为突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跪杀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成为左翼群体向右翼发难的集会，运动方向也逐渐被“反法西斯主义”（Antifa）等左翼极端网络所劫持，暴力和骚乱活动迅速在美国各地蔓延。如同特朗普政府长期纵容极右翼暴力一样，两党为一己之利，偏袒各自的选民基础。对于少数族裔所犯下的极端暴力，民主党及主流媒体也持双重标准。例如，2022年1月22日纽约市发生“枪击警察”事件后，民主党和媒体对之轻描淡写，淡化凶手的黑人身份。此后，纽约市数万名警察上街参加葬礼，无声地抗议拜登政府对左翼群体的偏袒。弗洛伊德事件与枪击警察事件、白人枪击少数族裔与少数族裔对白人进行报复，已成为左右翼矛盾升级的缩影，未来极左翼暴力和极右翼暴力的同频共振恐将更加严重。2021年，在美国发生的极端暴力事件中，极右翼暴力约占49%，而极左翼暴力已从2020年的23%上升到2021年的40%。<sup>[2]</sup>

#### （四）美国极右翼暴力与全球极右翼运动联系加深

冷战后，自由主义曾在全球攻城略地，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不断遭受保守主义的反弹。当前，右翼政府和极右翼组织在全球涌现，成为世界政治

---

[1]《美国FBI局长：美“国内恐怖主义”持续扩散》，参考消息网，2021年3月4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10304/2436433\\_4.shtml](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10304/2436433_4.shtml)。

[2]“Pushed to Extremes: Domestic Terrorism amid Polarization and Protest,” CSIS Briefs, May 17,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ushed-extremes-domestic-terrorism-amid-polarization-and-protest>.

的一个鲜明特征。基于对外来移民、文化侵蚀、福利分配和大政府的共同担忧，美国部分极右翼势力正在超脱本国民族主义的范畴，逐渐向保卫白人种族和西方基督教价值传统的趋势发展，构成欧美跨国右翼运动网络的重要部分。

在思想上，美国极右翼分子与境外右翼极端分子展开交流、相互影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指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拥有“最持久和最令人担忧的跨国联系”，经常与境外具有类似信仰的极端分子展开交流。<sup>[1]</sup>一些国家担心美国极右翼分子向西方国家的类似团体输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sup>[2]</sup>例如，“匿名者 Q”（QAnon）已从美国逐渐发展为一项全球性运动。同时，美国极右翼分子也从欧美类似团体的支持、右翼政党的上台，甚至阿富汗塔利班重新获得政权中汲取精神力量。

在资金上，美国极右翼分子不仅接受外部援助，也为其他国家的右翼运动提供资金支持。例如，在“国会暴乱”事件中，美国极右翼分子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曾接受来自法国公民超过 50 万美元的比特币资助。<sup>[3]</sup>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事件也获得了美国右翼和极右翼分子的实际支持。<sup>[4]</sup>

最后，美国极右翼分子前往国外进行实际作战和发动袭击。美国和欧洲极右翼组织之间的联系不限于虚拟世界和简单会面。苏凡中心（The Soufan Center）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曾成为跨国白人至上主义网络的中心，

---

[1] “Domestic Violent Extremism Poses Heightened Threat in 2021,”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March 1, 2021, p.2.

[2] David Brennan, “As Far-Right Extremism Flares in U.S., Allies Fear Transnational Threat,” Newsweek, March 2, 2021, <https://www.newsweek.com/far-right-extremism-flares-us-allies-fear-transnational-threat-1573145>.

[3] “Alt-Right Groups and Personalities Involved In the January 2021 Capitol Riot Received Over \$500K In Bitcoin From French Donor One Month Prior,” Chainalysis, January 14, 2021, <https://blog.chainalysis.com/reports/capitol-riot-bitcoin-donation-alt-right-domestic-extremism/>.

[4] 《美国输出动乱，对加拿大抗议活动煽风点火》，中国新闻网，2022年2月11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2/02-11/9673537.shtml>。

吸引了全球 50 个国家的约 1.7 万名外国人、30 余名美国公民前去参加战斗。<sup>[1]</sup>他们学习战斗经验、交流极端观点，进一步激发了全球白人至上极端主义运动。一些组织还将机构扩展至加拿大和欧洲并发动恐怖袭击，如“原子武器师组织”（The Atomwaffen Division）。

## 结 语

随着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社会的变化，美国原有的治国理念已难以继，正在推动美国进行国家大转型。极右翼暴力活动兴起的根源便在于美国国家转型遭遇了巨大困境，右翼保守派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遭遇全面侵蚀。当美国政治极化导致的政治机制功能弱化、右翼保守派内部开始分裂和极端化时，在联邦政府长期关注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共和党庇护极右翼势力的背景下，极右翼暴力获得了宽松的生长环境。极右翼暴力的兴起表明，美国既有的国家路线已无法妥善地应对社会的三组矛盾——种族间矛盾、价值观对立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张。拜登政府对极右翼暴力威胁的重视是美国联邦层次严肃对待该问题的重要开端。然而，拜登政府的国内反恐战略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政治与社会极化的态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等问题，需要拜登政府重塑美国国家的发展方向，恢复美国政治体制的弹性和活力，确立切实有效的制度性解决方案。但受左右翼群体之间严重割裂的影响，拜登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调整美国这艘巨轮的行进方向。

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兴起是美国国家转型遭遇困境的一种极端结果，它反过来又增加了美国国家转型的困难，并成为观察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指标。目前，极右翼暴力引发的社会危机并未使美国内部团结起来，却

---

[1] “White Supremacy Extremism: The Transnational Rise of the Violent White Supremacist Movement,” The Soufan Center, September 27, 2019, p.29, <https://thesoufancenter.org/research/white-supremacy-extremism-the-transnational-rise-of-the-violent-white-supremacist-movement/>.

加剧了两派的割裂。当下美国国内已有担心发生内战的声音，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的情况下，如果美国政治加大撕裂，左右翼的矛盾持续激化，军队维护宪法和民主的功能失调，左右翼之间很可能面临“武力决战”的最终时刻。不过，短期来看，在当下美国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在强大的情报和安全机构的管控下，右翼保守派仍可通过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等常规化途径来倾诉对现状的不满。因此，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并不会在短期内全面失控，而将继续朝着有组织的抗争运动及“独狼”式暴力袭击的方向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当下美国的种族国家基础——白人人口的比例正在持续下降，这将加速滑向不利于右翼保守派的方向，未来“种族国家”与“美国信条”的冲突会越发激烈。

极右翼暴力的兴起将促使美国进入新的国家发展方向，这也将深刻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行为。无论美国本轮转型是否成功，美国国家和社会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对于中国而言，这将会是一个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在国家大转型期间，美国的内政外交行动会变得更加极端，这需要引起特别的警惕。此外，极右翼暴力正在西方世界快速蔓延，并有跨国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在当下国际政治充满不确定性之际，欧美极右翼思潮和极右翼暴力兴起，将对各国外交政策和世界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收稿日期：2022-10-05】

【截稿日期：2022-11-25】

（责任编辑：马燕冰）